

“综合性”：不是搭积木，而是水乳交融

——专访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显章

○ 本刊记者 关悦



胡显章

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校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兼传播系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等；参与清华大学文科恢复和建设的领导工作。

但是，存在两个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一是，“综合性”不是多学科搭积木，更要如同钢筋水泥甚至水乳相融，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二是，科学与人文在文化上的融合，也是任重道远。为此，既需要一种“兼和”的哲学观，又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

注重“会通”：清华宝贵的文化传统

记者：您怎样理解“清华学派”的内涵和精神？

胡显章：所谓“清华学派”只是部分学者的提法，至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但是，清华的治学传统的确有自身的特色，比如清华国学院“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学术范式，引领了一个时期的学术潮流，不仅对清华，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学术文化都有久远的影响。这是当年虽有多个国学研究院所，但唯有清华国学院得以声名远播的一个原因。国学院存在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它的“会通”理念和范式在后来的清华文学院得以继承。实际上，梅贻琦校长所推崇的也是会通型办学理念。他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所倚重。这样的影响就更加普遍了。当然，这种“会通”的理念并非是清华所独有的，只能说清华形成得早一些、影响大一些。应当说，注重会通是清华宝贵的文化传统。

后来，在新时期清华恢复发展文科时，这个传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1985年，复建中国语言文学系时，明确了“以文为主，文理结合”的方针，开办了科技编辑专业，培养以理工学生为主体的双学士学位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主持清华文科工作时，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提

出了“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所依据的仍然是会通的哲理。要做好这一点并非易事，不仅要自觉遵循事物本来的规律，而且还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襟怀。

在新时期，特别是学校明确了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以来，在学科上基本实现了综合性的布局，为实践“会通”的理念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出现了文理学科结合的好趋势。但是，存在两个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一是，“综合性”不是多学科搭积木，更要如同钢筋水泥甚至水乳相融，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二是，科学与人文在文化上的融合，也是任重道远。为此，既需要一种“兼和”的哲学观，又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

记者：这种“会通”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广为提倡的“通识”教育？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倡导和施行“通识教育”理念，您觉得施行得成功吗？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胡显章：促进“会通”是通识教育追求的目的，关键是明确培养目标和教育过程中对“会通”的要求，它不仅仅是体现在知识体系的会通上，而且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会通；不仅仅体现在基础教育中，在专业教育中也要落实不



清华现已设置近百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

同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

通识教育发端于美国，至今已有两个世纪了。虽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至今仍缺乏公认规范的表述和共识。美国高等院校协会在2005年开始推动一场为期10年的“何谓通识教育”的大讨论和“弘扬通识教育价值”的运动；哈佛大学在19世纪以来先后进行过4次有关通识教育的改革，近几年又在通识教育进行新的反思与调整。

我国高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在理念上是相通的，但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除了突出强调是加强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还明确要求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提高学校的文化品位，创造了统筹教育全过程的多样化的形式。由于只有15年的探索，现在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要真正使文化素质教育成为广大干部师生的一项自觉行动，并且走上一条科学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还要下很大功夫。

当前，在许多学校和许多场合，比较多的是提通识教育，常指基础教学阶段的文化素质教育。在清华有“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提法，在通识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完成13个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学分，同时，还要求在专业教育中有效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与一些高校

不同，清华比较早地进行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并以核心课程作为主渠道。现在已经设置了近百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从我们对11个院系学生的调查结果看，有近2/3的学生认为相关课程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对约84%的教师教学效果是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而绝大多数认为是有收获的。但是，对课程和教师很满意的均为少数。同时，自觉在专业教育环节有效融入文化素质教育的也是少数。

教育教学中，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的现象普遍存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曾称，实践通识教育的困难在于：（1）没有人愿意去管。（2）没有教授愿意去教。（3）没有学生肯花精神去听。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一个共同原因是缺乏文化自觉。

记者：您说的这种文化自觉具体该怎样理解？

胡显章：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我们的教育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是面临世界性的价值危机的挑战，我们的教育肩负着提高师生人文素质的艰巨任务。二是信息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剧烈的竞争，要求高等教育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对人才的科学素养特别是创新素质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特别是像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面临着力建设创新文化、加速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巨大压力；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中国的崛起，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在植根自身民族文化沃土的同时，具有跨文化的胸襟和能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即将成为生力军的当代大学生在文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不少教师和学生对此都缺乏充分的文化自觉。大学教育应当自觉地肩负起以先进文化孕育人才、引领社会的任务，而前提是正确认识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袁贵仁部长曾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正是以文化育人的自觉为前提，以文化育人任务为根本目的。我们面临着普遍提高文化育人的自觉性和实效性的任务，其中推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仍然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为此，必须在教育思想、培养过程、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方法上进行持续有效的

重大变革，学校需要不失时机地加强顶层设计，并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上予以更加实际的支持。同时，还要努力进行大学文化建设，弘扬优秀的大学精神，建设好文化校园。

通识教育：人文课程应为重点

记者：在“会通”教育中，人文学科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清华的文科对学校和学生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胡显章：谈到人文学科的作用，原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一所大学如果不能在各个重要的学科领域都竭尽全力，包括对于探究人文价值，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等多种社会形态以及人类传统、文化和世界观起核心作用的人文学科领域，它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所杰出的大学。”

在王大中校长时期，清华的文科有了长足的发展。他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顾秉林校长也强调：“发展文科对整个学校的学科发展和精神文化塑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加强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就必须让我们的学生接受更好的人文熏陶，具有更好的人文素养，在思想和精神上更为活跃和充实。这都需要积极地发展文科。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人文教育就没有一流大学。”

就人文学科来讲，它涉及的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是关乎一所学校，甚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问题，涉及如何处理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易经》有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对科学与人文的最早论述。失去了任何一方，这个世界就不完整。对于学校来说，人文学科的主要组成是文、史、哲，不仅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也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而且，人文学科将影响学校的办学理念、大学精神和文化品位，影响师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所以在通识教育中，人文课程成为核心课程的重点组成部分。

记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华大学的文科发展曾一度被中断。当初在恢复清华文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胡显章：清华文科被中断近30年，恢复起来并非易事。在恢复发展的前期，主要面临着两个方

面的困难：一是对恢复发展文科的目的、目标、途径缺乏清晰的共识。在清华有着一一种可以称作“MIT”的情结，认为清华建一流大学是靠理工，文科更多是考虑教学的需要。学校的闪光点、兴奋点一度都在理工科，强势的理工科背景容易对文科起屏蔽作用，制约了对文科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二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一直到1998年寒假校领导班子务虚会上，大家对文科的地位、作用、目标、重点等达成充分的共识，并做出了建设一流文科的决定，明确了首先要下大力气支持文科建设好一流的师资队伍，清华的文科恢复发展才真正走上了快车道。

记者：您觉得清华的文科建设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国内外大学在这方面有何比较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胡显章：我想，从学校层面来说，一定要继续重视文科建设，特别是给予基础的文史哲学科以持续的支持。要更好地发挥人文学科的作用，特别是提高全校人文素养和引领社会的作用，并且进入世界学术前沿。对于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则应该在解决中国以至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比起其他学科，文科更需要积累，做到厚积薄发。包括：不同来源的学者，怎样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在不同观点、学统的交流碰撞中，形成学科的特色和传统。在比兄弟院校队伍更加精干的情况下，怎样更好地形成合力，包括发挥好清华多学科的优势；怎样重视已有的历史传统，又不背上因袭历史的包袱；怎样既面对现实又不趋时媚俗；怎样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又要有世界眼光，关注国外潮流与学术前沿，借鉴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更好地处理好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倡导建设性的批判思维，建设好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弘扬。

“文理兼长”：不能只看作一种工具性的目标

记者：在“老清华”，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会通精神对老清华理工科的影响？能否请您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胡显章：在老清华，虽然也存在建筑大师梁思成批判的“半人时代”的现象，但是，由于



2010年4月，清华学生艺术团赴美举办“硅谷之夜”专场演出，引起热烈反响

当时基础教育不存在文理分科的局面，清华又重视通识教育，所以，许多理工学者人文底蕴深厚。如顾毓琇， he 曾是清华首任电机系主任，后又任工学院院长，被世人誉为“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当然，像他那样的“业精于理，学博于文”的典范并不多，但是，像华罗庚那样善诗文，杨振宁那样通古籍的理工大家则不是个别的。这种文理相通，不仅在进行教学和研究时，可以防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甚至对立，而且有利于形成科学的思维和创新。正如钱学森学长所说：正是音乐教授蒋英夫人给自己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使自己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就我自己的情况讲，在中学时期文理不分科，课业负担较轻，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在美术、舞蹈、文学、制图方面都是积极分子。我的作文几次作为范文被推荐，同时我也酷爱物理、几何等，高中毕业时难以决定读哪一科。后来，我依据少时做机械工程师的夙愿，以第一志愿进了清华机械制造专业，二年级时被分到新成立的光学仪器专业。学校的课余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又提供了许多做社会工作的机会。我做过学校广播台的记者，展览会的编辑美工，系里“近卫军编辑部”编辑兼出版组长、宣委、班长等职务。留校工作后，担任过

辅导员，长时间“双肩挑”，在肩负光学仪器、精密机械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还选学了教育学课程，参加科技史研究。在80年代初期任精仪系教学副主任期间，我曾经担任过清华教学改革试点组组长，在精仪系开展培养自学和创造能力的试点，1985年这个试点组获得北京市模范集体称号。这段经历可算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吧。这些为我1991年到学校负责宣传和文科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然，我仍然是边工作，边学习——向清华历史学习，向专家能人学习，向书本学习，也向实践学习。我绝非是文理结合的典范，但是，以往对文科知识比较广泛的涉猎和兴趣，加上理工的出身，使我对实现文理兼容，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和基础。

记者：那么今日清华这种“文理兼长”的情况还多吗？有人认为，现在的学生似乎很难再取得老清华人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对此您怎么看？

胡显章：由于自蒋南翔校长以来，学校继承了老清华重视文理会通和文化艺术活动的传统。当今清华，也有许多兼通文理的学者，比如，设在精仪系的清华教工荷塘诗社就有许多擅长诗文的理工科教师；许多理工名师是教师合唱团的骨干；在每年举办的文化素质教育知识竞赛上，也可以发现一些理工学生诗文功底卓尔不凡。在中央工艺美院加盟清华后，科学与艺术在学科上的融合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校园文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学文理分科，大学教育专业化和功利化的影响，使得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以至矛盾的状况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做好文理兼通，推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和学术的综合创新，仍然任重道远。

关于孕育“文理兼长”学生的问题，不能只看作一种工具性的目标，更不能使其涂上功利化的色彩。实际上，促进科学、人文、艺术的融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追求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联和均衡，是人的创造力的本能。”“在教育上，实现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现代大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能够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之人才的希望所在。”时代大势是向前发展的，只要持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后人总会超越前人的。■